

继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后，又一部震撼中国文坛的鸿篇巨制



贺享雍/著

# 余忠老汉 的儿女们

重庆出版社

# 余忠老汉的儿女们

贺享雍 著

重庆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余忠老汉的儿女们/贺享雍著.-2 版.-重庆：  
重庆出版社，2000.11

ISBN 7-5366-3576-1

I . 余… II . 贺… III .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0956 号

## 余忠老汉的儿女们

贺享雍 著

---

责任编辑 王从学

封面设计 刘梁伟

技术设计 聂丹英

---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科情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1.75

字数 571 千

2000 年 11 月第 2 版

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3001—6000

---

ISBN 7-5366-3576-1/I · 661

定价：29.80 元

## 苍凉悲歌 警世力作

——评贺享雍长篇小说《余忠老汉的儿女们》

吴野

城市里，霓虹耀彩，车水马龙，既有灯红酒绿，轻歌曼舞，又还流淌着说不完道不尽的恩怨情仇。文学，你还记得作为民族根基的农村、农民吗？

不用说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以农立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就是截至今天，在二十世纪即将过去的时候，绝大部分中国人仍然生活在农村中，仍然依靠一方方黄土维系着自己和全家的生活。可以说，不了解农民，不理解农村，就谈不到理解中国；不了解农民的心路历程，也就说不上对民族精神史的了解。农村，这个现在往往被人以戏谑的口吻提起的“广阔天地”，曾经使一代又一代中国作家深深地透视了民族的心灵，透彻地摸准了民族的脉跳。像孕育万物一样，中华的黄土地曾让多少作家和农民的命运留下了动人的记载。

确实，从“五四”发轫的中国新文学，来自有着热切关注中国农民命运的传统，对于以农业立国，百分之八九十的国民都生活在农村的中国来说，这似乎是不需要特别的解释的。鲁迅的《祝福》、《闰土》等名篇，从新文学迈出的第一步起，就把关注农民命运、探索农民生存状况的创作定在了相当高的水准上。建国

前后的一段时间里，丁玲、赵树理、周立波、柳青等一大批作家，也始终用炽热的目光观察着那个时代的农民的人生历程，在文学画廊里树起了一批批足以折射民族艰难跋涉的历史进程的农民形象。八十年代后期特别是九十年代以后，文学自身感受到了转型期社会的巨大压力，手忙脚乱地寻求着自己的生存之路，多种多样的社会文化消费方式，又毫不留情地让文学曾经拥有的读者减少到让人难堪的程度。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下，有的作家开始冷落了读者，尤其是冷落了为数众多的农村读者。有的作家试图把作品“还原成纯粹的私人记录”，有的则宣称出现在自己笔下的只是“个人的一个梦”。

当然，在文学乃至影视作品里，农民和农村生活仍然时时出现。但是，不难发现，在许多情况下，那往往是用了城里人的眼光，城里人的心理，来进行描述的。它们提供给读者、观众的，要么是荒山野岭里的古风旧俗，野味十足的男女恋情，要么是在现代城市文明面前手足无措的洋相，就像前些年电视台春节晚会中出现的农民一样，总是靠土得掉渣的语言、动作，引起观众的哗然大笑。说白了，就是“大观园里人”看刘姥姥的心情。

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我们读到了贺享雍五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余忠老汉的儿女们》。

像书名一样，在这部作品里，你将寻不到开心，更得不到城里人对乡下的优越感。它能带给你的将会是你想象不到的沉重，想象不到的苍凉。一股气憋得你心里胀痛，憋得你想推开窗户大声呼号。

在这部作品里，作者不是从男欢女爱、恩怨情仇的视角去展开他对农村生活的描绘。他选择了这样一种十分沉重的宏大视角：从农民现实的生存境况中，从勤巴苦做的农民的真实感受中，去思考、去发现关乎民族兴衰、关乎国家命运的时代大课题。在整部作品中充满了浓郁的忧患意识，因此，我们不必求全责备地要

他面面俱到地去表现经济振兴、莺歌燕舞的一面，也可以设想在接触如此沉重的话题时，他不是也不可能完全没有任何顾忌地畅所欲言，但他毕竟笔酣墨饱地写出了当今农民生存的艰难，振聋发聩地为农民大声地鼓与呼！不用说这本身就是值得重视的“警世之言”。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说，它成功地从一个侧面，画出了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在经济腾飞的起点上，所经历着的挣扎与阵痛是何等的惨烈。为了这个转变，农民承担何等沉重的负载，以及在这种颇有些悲壮意味的冲突中，新一代农民又如何从中崛起。就艺术描绘而言，尽管她还稍嫌粗糙了一点，但她毕竟是一部难得的凝重、大气的作品。转型期社会将要留给后人的，不应当只是轻歌曼舞、恩怨情仇一类轻飘飘的东西，历史将会淘汰它们，沉淀下来的只会是凝重与深沉。

贺享雍把笔尖对准了一个“种田大户”。这是县乡各级领导树立的标兵，是在报纸、广播上经常受到表扬的先进典型，是远近闻名、令人羡慕的“富裕户”。可是，随着画面拉开，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却是一幕幕令人心里倍感“苍凉”的戏剧，在一家之主余忠老汉身上，几乎集中了作为中国农民个性特色的忠厚诚朴、谦忍待人，像牛一样的节俭勤劳，像牛一样地逆来顺受。可是，这种忍让厚道却似乎正好成了欺侮、掠夺的天然落点。卖了一万七千多斤“合同定购粮”，七扣八扣，到手的竟然仅仅二百多块钱。各种税费按田摊派，种得越多，摊得越多，连农民见也没见过的什么“程控电话”的建设费用也不由分说地强加在他们头上。真像他的小儿子文义算的账：一亩水稻就要摊上一百五十多元，剩下的不过五十多元，而且农民自己所投入的劳动力还没有计入成本。现实摆在种田人面前的道路也实在过于险峻了。所以，余忠老汉就身不由己地陷进了“种得越多，负担越重，就不得不尽量地多种”的看不到尽头的迷宫漩涡中了。农民这个历来对土地有着斩不断的深情的社会群众已经产生了对农业的失望与厌倦。他

们在痛苦地呻吟：“种庄稼越来越不合算了。”他们对农民在当今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已经产生了疑虑：“种庄稼要靠老天爷帮忙……还有这税那税，这款那款，一旦涨上去，一时半会就别想减下来，国家穷，底子薄，就像一个家庭，要搞点啥事，又没有钱，就要想方设法把儿女们的私房钱刮出来一样，哪朝哪代，农民都是最下贱、最听话的人，别人的手不伸进你的兜里来掏，又掏谁去？”这当然不是余忠一家的特殊遭遇，也是非正常的情况。地方经济快速发展对资金的渴求，县镇领导对创造辉煌政绩的强烈冲动，分解成一条条看来似乎都不算很重的负担，这牵涉到了方方面面的领导部门，写出这些来是要得罪人的。可是，农民出身的作家贺享雍忍不住满腔的愤怒，已经在秉笔直书，大声疾呼了。

然而，他毕竟是个处于创作过程的作家，正在同他的人物一道经历着人物必然会经历的一切。将要发生的事，显然不取决于他个人的情感或愿望。于是，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写出余忠一家难以逃脱的人生苦难。

村支书为了完成任务，卸掉包袱，强行把无人照管的五保户送到余忠家中，要他负担起老人的生老病死，在余忠全家人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中硬性地加上了一个沉重的担子……

文富同玉秀的婚姻是一个注定了的悲剧。当订婚的天平上加上了丢掉土地进城当上了包工头的石太刚沉甸甸的金钱后，倾斜便只是时间与方式的问题了。强迫农民拔掉豆苗，栽桑种麻，蚕病了没人管，种出麻来没人收购，一切损失只能落在农民自己头上……

迫切需要化肥的时候，买不到化肥；急需农药的时候，买到的却是假农药，农民的眼泪只有往自己肚里咽……

贺享雍太熟悉农村的一切了。他写余忠老汉一家，笔墨却不由自己地伸开去，涉及广阔的城乡生活画面。他的笔触不但渗透到余家几兄弟的个人生活变故中，也渗透到村、乡干部和县城的

生活中，展示了一幅当代的“清明上河图”。只是这幅图里，显现出的不是古典画面里的那种典型平和，而是充满了喧哗与骚动。在位时的村支书毛开国倒也神气活现，下台后却为余忠不念旧恶、宽厚待人感动得老泪盈眶。逼着农民干这干那，而自己长期贫病交逼的乡干部陈民政，临死之前还为“没想到我们一片好心，竟给你们带来了损失”而愧对乡亲，死不瞑目。县里忙着搞什么龙舟节，乡里忙着制造假乡镇企业产品去应付差事，闹得农民进城买农药也办不成事……这一幕幕让人哭笑不得的喜剧、悲剧、闹剧，使这五十多万字的篇幅，耀射着斑斓的五光十色，洋溢着说不完的酸甜苦涩，让人回味无穷，思之不尽。余忠的老诚质朴，毛开国的前倨后恭，陈民政的有苦难言，都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像浮雕似地从纸面上凸现出来。现在的评论家似乎早已不再乐意运用“典型环境与典型形象”这类术语，似乎它们已经是过时的陈旧的语言。但是，我想，似乎也只有“典型意义”这个词才足以表明这几个人物形象的份量。他们是你在报纸上、文件上看不到的当代农民的真实灵魂，是你在报告中闲聊中听不到的当代农民的真实心声。

这是一部厚重苍凉的小说。尽管作者给了故事一个完美的结局，但恰好是这个结局，使人感受到更大的悲哀与更多的无奈。文义要依凭法律，找政府打官司，挽回订了合同种了麻却无人收购，给农民造成的损失。这个行为无疑是公民的权利，是无可非议的，连律师也明确表示要给予支持。但是，状子递上去以后，却受到了行政权力的毫不留情的阻遏。法院退却了，律师也退却了，客观事实毫不含糊地证明，面对各种行政权力，农民想依靠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是行不通的。正是在这个关口上，作者顺手调来一个省委书记，让文义的人民来信恰好落在他的手中，首长批复，问题立马得到了解决。不知道这究竟是应当使人高兴，还是更加令人感到悲哀？作者也许有他的不得已之处，或是有某些

想法，但它留给读者的却会是更多的追问与思考。

在余家几个儿子中，唯一上过高中的余文义，在性格上逐渐表现出跟父亲和两个哥哥不同的特点，这是时代生活在飞跃中前进的折射，同余忠老汉的性格形成了越来越强烈的反差。这个有点文化、爱动脑子的青年确实有许多不同于他的父辈的地方。诚然，在开始时，他对毛开国想在他们家刚开挖的渔塘中占个“干股”的反抗，多少还有点冲动之中的突发性质。越到后来，他的行为便越来越显出了是思考的结果。对农业生产的失望使他外出务工，但外出务工的经历，又迫使他重新寻求自己的出路。最终他回到家乡，立意发挥本身的优势，创办小乡镇企业。事情成功与否，是否一帆风顺，并不要紧，关键的是经过几年的折腾，他生活在明明白白的思考与实践过程中，追求着自己给自己确定的目标。作者对余文义的这个渐变过程，写得很细致，分寸掌握得比较恰当，没有拔高他，没有把过多的期望寄托在他一个人身上。当然这也是由于作品所要着重描写的是内地的农村，不可能放开笔墨，跟着文义的脚步过多描述沿海城市的生活场景。因此，作者是让他在一段曲里拐弯的人生旅途中，一点点地成熟着，他在悄悄地不显眼地向人们预示着农村新一代人正在逐步取代老一辈人，独立自主地创造着自己的人生。如果说，在对待命运的态度上，文义同父亲形成了反差，那么，在对待爱情的态度上，文义同他的二哥文富也正好形成对比。对于爱情与幸福，文富不是没有向往与追求，然而，在现实矛盾面前，他却显得过份的被动与慌乱，看不到前途，想不出办法，甚至还不如几经折磨反而坚定起来了的玉秀。也许作者对文义的爱情生活的描写多少有些许简单，线条粗疏了些，但在作品中，作为反差，它却正好映衬出了余忠老汉和他的儿子文忠、文富的性格的软弱与生计的困窘。

在着力塑造农民形象的同时，作者也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幅从县到村的各级基层干部的素描。其中，我认为写得极其传神的

是陈民政和村支书毛开国，尤其是陈民政，虽然着笔不多，但他在几个关口的出现，都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衣着简朴，病容满面，四处奔走，最后却以反而坑了农民抱憾而终。陈民政辞世的那个场面，简直可说是具有震撼力的场面。当他在那个贫穷破败的家里大口地吐血，生命已经走到尽头的时候，为了卖不出青麻而愤怒的农民正在乡上闹个不休，有的已经闹到他的病榻前来了。而一贫如洗，终生劳累的他却满怀着对乡亲父老的负疚之情永别人世。

也许由于作者在构思中，过于确定了作为各种负担、压力的承担者的余忠的个性，因此，在全书不算太短的时间跨度和不算太少的情节演进中，余忠的个性却缺乏随之而发生的变化。他总是那么老实、厚道，总是那么忍让、谦和，好像永远也不会怀疑什么，好像怎样也激不起他一点点火气（除了对儿子们发火以外）。而几个儿子在他的阴影笼罩之下，也太缺乏鲜明的特点。老大余文忠几乎就是父亲的影子。老二文富除开与玉秀的婚姻变故外，在主要情节进展中也总是走不出父亲的阴影。现实生活中人的性格的复杂性，人的内心的复杂的矛盾冲突，在余忠老汉和文富的身上，似乎还没有得到本应得到的充分的表达和更细致的刻画。毫无疑问，在文学圈子里，贺享雍对农村生活的熟悉程度是无可置疑的，特别可贵的是他对农民的那种深厚的感情，更是文学创作所不可或缺的要素。但是，在创作过程中，有时也需要控制住自己这种丰富强烈的感情，站开一点，冷静地（必要时甚至是不惜残酷地）潜入人物内心深处，去挖掘其中的细微曲折的冲突，去揭示其中的痛苦的自我挣扎，让人物的性格从书页上凸现出来。一部《余忠老汉的儿女们》，明白无误地显示出了贺享雍创作的潜力，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的下一部作品将会是超越这个水平的突破。

（作者系著名评论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原文学研究所所长。）

06·3·19

此日，遂不复曾燃足，竟因烟具其武，因代手许支林畔烟具容，林前脊亦，案中尚忘取丁不留下管事，取出的口关个几立世带烟另起。然而烟具本丁故而灵从吐气最，或真妙四，而翻突这个烟具，而这个烟具着出不卖丁火，却仍用老少同来尝与食去，血和眼泪大里滚的烟来而翻突——评长篇小说《余忠老汉的儿女们》

斯文忠老汉之父余忠老汉，对吸食烟斗，嘴吸食一面。丁  
→ 沿海城市 袁基亮

### 一、情节梗概和作品的主题

《余忠老汉的儿女们》是一部反映农村现实生活的长篇小说。当代农村题材长篇小说的一些名篇，如《三里湾》、《创业史》、《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古船》等等，多以家庭为结构来配置人物，并由内而外串联成一张更大的人际关系网络；与此相似，《余忠老汉的儿女们》着力描写了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命运遭际，它以余忠老汉为主干，以余家兄弟为分枝，形成一个延伸的枝形结构，并依此来组织情节，铺叙故事，展示了一幅当代农村生活的广阔画卷。

余忠老汉是一个种了一辈子田的农民，土地承包后，他家的田越种越多，到了1988年，竟包下了30多个人的地，成了远近闻名的种田大户，成了县、乡树立的标兵和报纸、广播宣传的先进典型。可是，随着情节的展开，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却是一幅幅令人心里倍感“苍凉”的画面。在一家之主的余忠老汉身上，集中了中国农民的忠厚诚朴、谦忍待人、节俭勤劳的性格特点，可是这种忍让厚道却似乎正好成了欺侮、掠夺的天然落点，卖了一万七千多斤“合同定购粮”，七扣八扣，到手的竟然仅仅二百多块

钱。各种税费按田摊派，种得越多，摊得越多。连农民见也没见过的什么“程控电话”的建设费用也不由分说的强加在他们头上，就像他小儿子文义算的账：一亩稻谷的收入才二百来块钱，化肥、农药就要花去十多元，再加上税收、提留，一亩水稻就要摊上一百五十多元，剩下的不过五十多元钱，而且农民自己所投入的劳动力还没有计成本，现实摆在种田人面前的道路太艰难了。所以，余忠就身不由己地陷进了“种得越多，负担越重；负担越重，就不得不尽量地多种”的怪圈中，农民从来以种田为生，视土如金，现在却痛感“种庄稼是越来越不合算了。”老汉对一家人的前景充满了忧虑和失望，“去年望到今年富，今年还穿衩衩裤。”这样的日子还要熬到什么时候？余家父子怎么也没有想到，就在这样的处境中，命运还将无情地给予他们一次又一次的打击。

村支书假托民意，挟嫌报复，将无人照管的五保户强行送到余家，要余家负担老人的生养病死，给他加上了一个更沉重的担子……

二儿子文富同玉秀姑娘的婚姻中途夭折，玉秀迫于父命嫁给了有钱的包工头，给余家罩上了一片阴影……

迫切需要化肥时却买不到化肥，大儿子文忠反而枉背上了哄抢化肥的罪名……

为治稻田虫害，余忠老汉用卖掉儿子结婚家具的钱，从国营商店买来农药，竟是假冒伪劣产品……

乡里执行县里的指令性计划，强迫农民拔掉成熟的豆苗，改种桑麻，结果却是蚕多桑叶少，只有任凭蚕子死光；青麻种出无人收购，供销合同成了废纸，一切损失最终落在农民头上……

对于青麻事件，县上的解释有两条，一是县财政困难，二是外国搞经济制裁。言下之意是要农民吞下苦果，政府不承担责任。这个说法，老实厚道的余忠老汉可以接受，但说服不了像余文义这种有知识、见过世面的年轻人。文义企望依凭法律，和政府打

官司，但是在行政权力的阻遏下，却没有人站出来为农民主持公道，法院连案子也不予受理。幸亏后来省委检查组到了县上，省委高书记也知道了此事，在他的出面干涉下，问题才终于得到了解决。

在小说的结尾处，文义在南方闯荡一番之后，回到家乡，着手创办乡镇企业，决心去开拓一条新的生活道路。

作品所描写的各种人物的生活经历与众多的事件无疑具有普遍的真实性，它以有力的笔触揭示了当下农村生活中各种尖锐、复杂的现实矛盾和农民艰难的生存状况，表现出对农民命运的真切关注，对农村变革和发展的深入思考，称得上是一部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的警世之作。

小说的主题既是作者对生活的理解，也是读者对形象的感受，两者之间可能一致，也可能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总的来说，无论是作者的表现还是读者的感受，在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上越来越趋于丰富多样，从对生活的某个侧面日益扩展到多侧面、全方位的认识。

文学作品除了它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和历史内容之外，特别是长篇小说，必然也要表现人的经验世界，描述人生的体验。无论作品反映什么，都不只是社会生活的表象，而要在现象之后揭示人生的意蕴。小说总是通过对人的个性和命运的刻画，通过对人的行为和心灵的解剖，达到对人生世界的展示。因此，在作品中无论描写什么，都是人生化的表现，渗透着人生的意识，传达出人生的意义。

当一个一个的灾难和祸殃降临到余家这个普通的农民家庭，我们与主人公都会发出“这到底是什么？”的追问。当这些灾难并非是由于主人公的过失，出于主人公自身的原因而降临，我们便只能将其归之于命运。命运是无来由的，毫无道理可言的，因而是荒谬的。从作为自给系统的文本观之，就会得出这个结论。其

一，作品主人公被充满敌意的、刁钻古怪的盲目力量所包围，总是处在随时发生意外突变的环境中。其二，在小说的人物系统中，几乎所有的人物都与余忠父子处在矛盾中，余家就如同这个系统中的一个孤岛。其三，整个人物系统全都受制于这个系统外的否定性的力量。不管是余家父子，还是乡干部陈民政，乃至整人害人的村支书毛开国，无一不是命运无端捉弄的对象，无一不陷于无奈窘迫的境地。从文本内在关系来看，即使是省委书记扭转局势，锁定胜局，仍然不过是命运无常的表现。与贺享雍所写的短篇小说一样，这部五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同样表现了一种苍凉沉郁的人生况味。但是另一方面，面对命运的重压和无情打击，主人公以其对于苦难承受的惊人韧性，表现出一种虽然无奈而又不放弃有为的生命力，最终显示出人对命运的拒绝和抗争。所以小说揭示的人生意蕴是复杂而深邃的，既表现了苍凉悲苦的命运感，又描绘了一幅渗透着生命意识的人生景观。

## 二、长篇小说的人物塑造

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最主要的艺术任务是塑造人物。作品要感人，首先是人物要感人。一部长篇小说的成功往往取决于能否刻画出栩栩如生、富于个性的人物形象。把握人物的性格特点，理解形象的精神特质，同样是文学批评的首要任务，也是本文这一部分的重点。以下就让我们对长篇小说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具体地来作一些分析。

### 1. 余忠老汉

即使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农，他的性格也显得过于善良和谦忍，显然作者着力要塑造一个堪称典范的道德形象。一方面我们从作品中可以十分清楚地感觉到，这个人物的道德表现带着

显著的理想化色彩，同时在这种理想色彩与人物所处的环境和遭遇之间，又呈现出强烈的反差。难怪有评论者会认为，作者对其笔下的人物缺少一种批判的眼光，没有在纯朴善良与逆来顺受之间划清界线。也就是说，面对别人加之于他的伤害和凌辱，读者分辨不出他到底是在以德报怨呢，还是在委屈求全、忍气吞声。

这个矛盾特别集中地显露在供养五保户老人的事件中。余家父子开塘养鱼，村支书毛开国企图掺和进来，表面上说是共同投资，其实是想不劳而获。遭到余家老三文义的拒绝之后，便怀恨在心，利用其职权操纵所谓“民意”，将五保户老人余天志硬性交给余忠一家供养，无论吃穿病痛，皆由余家独立承担。当毛开国派人把天志老人背来时，家里人一致反对，认为这分明是村支书挟嫌报复，欺人太甚。然而此时，余忠老汉制止了儿子们的举动，指着天志老人，给他们上了一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传统道德课。

人啦，良心都哪儿去了？你们看一看，他成啥了？搭

张火纸在脸上，都可以哭了！我们也是庄稼人，心子都是肉做的呀，人家还买母行孝呢！何况他还是你们一个

爷爷辈呢！  
表面看来，他的这番话是对儿子们讲的，其实是针对毛开国以及自私的村民们来的，从更深的层面来看，这也是向不公正的命运发出的呼喊。

（天志老人）他过去是啥样的人？精精壮壮一条汉子，挑三百斤毛谷子走二里，肩都不换一下。那个时候，哪个不夸他？谁家有个修房造屋垒猪圈，打个招呼就来帮了，哪家没找他帮过忙？种了一辈子庄稼，现在动不得

他以老人悲惨的处境追问：好人为什么没有好命，恶运为何降临？他既是在为老人鸣不平，也是在诉说自己的满腔悲愤。

可是谁能反对命运呢？面对命运的打击，无以抗争的余忠老汉只有用“良心”来作为自己精神上的支撑，以道德上的自我，以高扬道德秩序，来对付命运的无常。在无情的命运面前，良心从来就是人的自我安慰，道德乃是最后一道精神屏障。

这就表明，余忠老汉所显示的善良、慈爱的道德姿态其实是一种防御策略。他的性格，其实是无意识的策略需要所形成的人生态度。当他把用以解决危机的策略理想化，于是顺从、退让就变成了善良、厚道的美德。

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做法实际上具有明显的强迫性质，一是外在环境的强迫，一是内心深处的自我强迫。他是被迫去做的而不是自动想要去做的。像余忠老汉这样长期在艰难环境中生存的农民，往往形成应付压力和冲突的谦恭、忍让、顺从、温良的策略办法，以此来减轻他们内心的焦虑，并且防止更大的进一步的伤害。为了化解冲突，获取安全感，他们甚至可以不惜压制内心的情感和思想，为了树立自己理想化的道德形象，甚至可以不顾自己的利益和由此带来的经济上的损失。从实际情形来看，供养五保户老人这样的负担根本是难以承受的。当然我们不要忘记，在他们的幻想中，道德确乎具有高于命运的力量；而且按照传统的观念，“孝道”从来就被认为具有改变命数、换取好运的神奇作用。

为了印证上述看法，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文富的未婚妻玉秀是一个重情重义的姑娘，但是其父嫌贫爱富，竟中途变卦，强迫她嫁给品行不端的包工头石太刚，婚姻的不幸加之对文富的歉疚，使她陷入十分痛苦的境地。后来，文富在三弟文义的耐心启发、开

导之下，了解了事情的真相，和玉秀重新沟通了感情，并且下决心通过法律的途径去争取自己的幸福。在这一场婚姻悲剧中，年轻人之间所表现出来的对感情的忠实，对人的理解和信任令人感动，然而余忠老汉又是如何来对待玉秀的呢？令文义、文富无法理解的是，父亲的态度竟然是决不原谅，决不宽恕。这难道就是他那个质朴得可以接受很多欺骗，宽厚得可以承受很多不该承受的负担，容纳很多不该容纳的坏人坏事，仁慈得见了比自己更不幸的人就恨不得脱了裤子给别人穿的单纯的父亲吗？可是现在，为了维护自己脸上和家庭的一点点可怜的面子，他竟然对一个钟情于自己儿子的善良、温柔、不幸的女人，难以容纳。竟然可以置亲生儿子的幸福于不顾，固执得近乎愚顽，并且说出了许多伤害别人的、如俗话所说：“牛都踩不烂”这样的话，这又是多么可怕的、复杂的人性啊！

这表明，余忠老汉的善良、仁慈和宽厚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有选择、有条件的。下面再来看看与“生养”对称的情节：“死葬”。乡干部陈民政死后，余忠老汉让三个儿子跟他一起去为死者送葬。儿子们心头不愿意，老汉就教育他们说：“他这辈子虽然没办成啥大事，可也算是把心交给了我们老百姓，我们不能做无情无义的人！”描写祭奠的仪式场面只有很少的一点篇幅，却意外地具有一种催人泪下的效果。

描写祭奠的仪式场面只有很少的一点篇幅，却意外地具有一种催人泪下的效果。父子四人一齐弯下腰，为陈民政磕起头来。正磕头，忽然身后传来一阵啜泣。他们回头一看，原